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张友国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项重点任务。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后,这是首次以“加紧”来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一步凸显了这项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可以说,“加紧”“协同”“全面”一起构成了当前把握和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三个关键词。

“加紧”意味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尽快在绿色转型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成效,以适应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协同”概括而言是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也就是要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但其引申含义还包括要协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绿色转型,强化支撑绿色转型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全面”就是要将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把握加紧、协同、全面的内在逻辑

我国经济正在加速转型,社会结构也在深刻调整,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强调“加紧”“协同”“全面”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

国内外形势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必须“加紧”。其一,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要目标,需“加紧”发力。其二,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具有外部性,需要有政府“加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推动,需由政府制定的有效政策措施与市场机制充分、有机结合来推动,让各级政府更好发挥能动性,积极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一起推动绿色转型。其三,“加紧”有利于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同时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需要“加紧”与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匹配,并最终与高质量发展相融合。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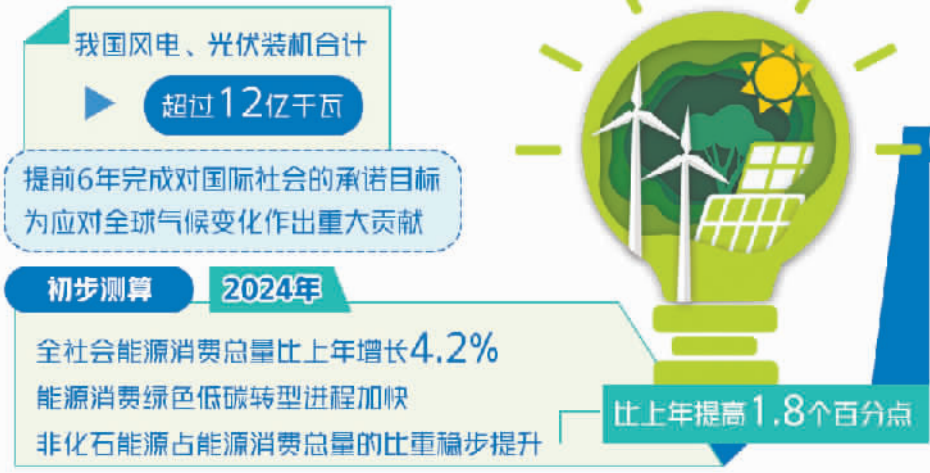
外,绿色低碳发展已成国际潮流,发达国家都在竞相发展相关技术和产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上加大力度、加快节奏是应对国际竞争、抢占先机、赢得领先优势的关键途径。

“协同”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必由之路。其一,降碳减污扩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协同,也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相协同,二者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都体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降碳减污扩绿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其带来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也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因此必须有效发挥协同作用,强化彼此的一致性。这也是中央强调要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应有之义。其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条件支撑,特别是先进绿色低碳技术支撑,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以更有效地激发全社会形成绿色转型的合力。因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科技创新、政策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必须协同起来。其三,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发展差异大、各具特色优势,区域协同是以优化生产力布局和资源空间配置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同样需要强调“协同”。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巨大,生产和生活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环节的资源浪费、污染排放等生态环境不友好行为,都可能产生巨大的生态环境影响。同时,我国地域广袤,不同区域之间生态环境空间联系密切,任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不到位,都可能对其他地区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影响。此外,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大气、水、土壤、生物多样性等,必须将生态环境系统各方面的保护与改善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统筹规划之中,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不能顾此失彼。

聚焦重点找准绿色转型关键路径

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夯实物质基础,又需要强化制度保障,必须坚持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从“加紧”“协同”“全面”入手,区分各项任务的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



尽快实现突破性进展,走出一条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健康发展。生产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活动领域,生产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因而也就基本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进程。绿色低碳产业是引领生产领域绿色转型的中坚力量,其健康发展将对生产领域绿色转型产生直接、积极和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将通过提供绿色低碳消费产品、技术和公共基础设施,极大促进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对此,需以财税、金融等的优惠政策大力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农业等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和零碳园区建设。加强对纺织、化工、钢铁等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改造提升,为绿色低碳产业创造市场空间。鼓励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积极培育和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带动“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强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发展,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积极营造绿色低碳产业健康发展生态,特别是鼓励区域间协同发展绿色低碳产业,避免“内卷式”竞争,不断提升绿色低碳产业国际竞争力。

以积极稳妥降碳为战略重点。降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战略方向。一方面,降碳与减污扩绿具有高度一致性,降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减污,也能促进相关资源效率提升,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扩绿。另一方面,降碳主要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更新节能设备来实现,积极稳妥降碳能够更直接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生产技术水平提升,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最终增强降碳减污扩绿与增长的协同效应。在强化降碳的制度保障方面,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为此,需加快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将交易主体从电力企业扩大到其他碳密集型行业企业,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调控机制,探索配额有偿分配机制,建立市场稳定机制。加紧推出科学合理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和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尽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和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

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来释放绿色生产力,这不仅有助于撬动大规模投资直接拉动绿色需求,而且能够通过提供大量高品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潜在的绿色消费需求。为此,需加快实施重大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加快推进“三北”工程和森林、草原、河湖、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防汛抗旱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高质量生态产品供给创造新消费需求,依托良好生态资源、自然景观、原生态种养业、特色生态农产品等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乡村民宿、健康养老、健康饮食等绿色经济新业态。加快构建生态信用体系、生态产品资产证券化路径、生态产品线上线下交易模式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激励。在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中注重系统集成、提升效能,能够有效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动力和保障。为此,需聚焦核心目标,统筹法律、经济、行政和社会等多个维度,促进各项知识产权改革举措的良性互动和整体效能提升,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高效能的知识产权制度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系统集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能够对科技创新活动形成激励和保护。现代科技创新不再是个体的单打独斗,而是有组织、有规划、成系统、成链条的社会行为,是一个涵盖发明创造和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系统工程。知识产权作为科技创新的纽带与桥梁,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其转化运用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关键环节。推动知识产权高效运用,能够有力促进创新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加速释放创新活力,实现创新成果从创造、转化到产业化的系统性突破。另一方面,有助于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各国都在积极运用国家力量争夺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创新不仅是企业间的商业竞争,同时也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知识产权治理水平的较量。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覆盖领域广、涉及方面多、参与链条长,只有充分整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信息等各类资源,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国际合作全链条,才能建立起与国内外国际形势相适应的知识产权治理相关体制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更好提升我国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实施和管理依据主要是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单行法,体系较庞杂,各管理部门间协调机制尚不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存在明显短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科技创新的激发和保障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基本原则和基础规则的系统集成,进一步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概念、性质、范围、权利人的权利和义务、侵权认定标准以及救济措施、执法机制、域外适用等核心内容,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奠定统一的法律基础,推动提升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效能。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的运用转化关键要依靠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行业组织等各类创新主体发挥作用,通过各种力量的系统集成,提高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和协同保护效能,使其更好服务于整个创新生态系统。

发挥好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用。着力促进创新供给与需求的高水平对接、高效融合,优化全国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体系,支持国家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连接区域和行业机构,在知识产权交易、专利导航和推出专利密集型产品等方面强化平台功能,加强多元化知识产权金融支持,降低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成本,培育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良好生态。

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高质量创造机制,鼓励企业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加快知识产权运用转化,将知识产权管理融入研发、生产、经营全过程。支持企业建立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大力培养专业化运营人才,提升知识产权市场化运作能力。

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源头作用。当前,我国企业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已超过50%,但高校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却长期低于5%。要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以产业化前景分析为核心的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通过与企业开展精准对接,促进高价值专利的转化应用,加速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实现产学研深度协同,贯通从基础研究到高价值专利培育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转化路径。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知识产权系统集成不仅要着眼国内制度体系建设,还要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作网络的系统集成,能够有效促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资产评估、成果推广应用、转让许可等的协同发展。要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维护国际知识产权多边体系,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建立国际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为跨国创新活动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

徐建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经营主体日益壮大活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有利于增强发展新动能、形成发展新路径、拓展发展新空间,助力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先机、掌握主动。

第一,产业体系转型升级有效发挥载体作用。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产业是生产力的载体,产业转型升级是生产力变革的重要表现。新质生产力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蕴含在以高端、智能、绿色、融合为发展方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之中,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上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过长期的去工业化进程,其竞争优势集中在高精尖领域和技术密集环节,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失衡,供应链体系制约明显,产业体系的循环畅通性和内生成长性存在不足。反观我国则不然。我国经济总量超过130万亿元,拥有成熟高效的传统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和势头向好的未来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突出。

在我国制造业结构中,消费品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装备工业营业收入结构比例大致为1.9:3.4:4.5,在主要国家中是结构最为均衡、部门最为完整的。总的来说,我国具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深厚产业基础、宽广发展领域、强大内生动能。通过采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拓展转型新空间,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塑造竞争新优势,加快未来科技和产业一体化布局、培育发展新增长点,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有条件有能力推陈出新,在各行业各领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第二,科技创新促产业创新构成双重

引擎。

培育新质生产力,创新起着主导作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研发与制造同频交互,从科技创新突破到产业转化应用的周期大幅压缩,进程显著加快。我国既是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制造大国,也是科技日新月异的创新大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产业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叠加构成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双重引擎。

我国有能力统筹整合庞大的制造能力和优质的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构建起高效、优质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形成先进生产能力、塑造产业先发优势。在十几年时间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技术创新突破,产业快速崛起并引领全球发展,这也印证了一体部署、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带来的巨大发展机会和增长潜力。随着越来越多的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突破,将催生更多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形成更具创新性、更加高效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第三,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培育发展生

力军。企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体。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数量多、类型全、梯度完整的现代企业队伍。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外资开放准入,进一步提高各类企业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将涌现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动能活跃的经营主体。

多年来,我国拥有的大量实体经济扎根实业、坚守制造、深耕细作,在技术上攻坚克难,在产品上追求卓越,在市场上开拓创新,其经营模式正在从过往的成本价格竞争向

更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在新技术变革影响下,传统领域的制造业领军企业已成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数字智能技术应用、绿色低碳技术实践的重要群体。2024年,我国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4.1%,建设5G工厂4000余家。随着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专注新技术研发、锚定新赛道发展、探索新市场开发的创新型企业将加速涌现,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发展产业的主力军,为培育形成新增长点提供更大底气。

第四,以超大规模市场促进全链条顺畅循环。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提供丰富多样、潜力巨大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当前,消费需求呈现高端化、品质化升级趋势,投资需求向高端、精尖、新兴产业转变,成为引领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布局的重要方向。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意味着能够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创设各类应用场景,培育起完整内需体系,实现生产与消费、新业态与新需求之间的衔接互促,形成“科技创新—生产制造—市场应用”全链条顺畅循环,从而加快新技术在实践中探索验证和推广应用进程,并借助快速成长的市场需求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我国依托规模庞大、丰富多样的制造业场景,以新技术渗透应用为支撑,“技能+智能”“制造+智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制造新模式快速兴起,在“智改数转”、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工业互联网等方面走在全球前列。此外,面向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科技等新领域,我国建立了系统完整的验证中试、孵化转化体系,为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提供坚实支撑,有利于新技术从科研机构、实验室走进工厂、走向市场。

第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改革命题,需要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其有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紧密结合。围绕发展实体经济、推动科技创新、激发要素活力、扩大开放合作等,我国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助于打通束缚发展的堵点卡点,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需要推进创新性、深层次、系统性改革。当前,在科技创新上,“从0到1”颠覆性创新的攻关机制还不完善,“从1到100”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还存在瓶颈制约,迫切需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产业转型升级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存在投入不足、收益激励不够等问题,需健全相关体制机制,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完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在要素配置上,知识、资本、数据、人才等要素流动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通过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激发要素活力,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